

## 零距离

汤玲玲



# 最棒的一代

友人最近发来的一段感言说道：“我们这一代，是最后一代奉养父母的孩子，也是第一代不用子女奉养的父母。我们是最棒的一代！”这个说法意味着，未来的年老一代，纵然珍惜与儿孙的交流，但更期望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，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。

春节假期过后紧接着参加了一项关于老龄化课题的研讨会。为期两天的国际研讨会，是由国大文学暨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“次世代研究所”（Next Age Institute）所主办，着重讨论与在地养老有关的环境、设施、社区服务、居家照顾护理、社区参与等课题。适逢金禧预算案出炉期间，与会者提到本地的情况时，也适时加入最新的与援助年长者有关的信息。

每回参加老龄化社会的研讨会时，都深深觉得亚洲社会面对的老龄问题越来越棘手。印度的老年人口在2050年将超过三亿，来自印度的老年学者忧心忡忡地说，家庭的结构正在改变，现有的老年福利计划，例如养老金计划、养老保险制度等措施，明显不足以照顾日益增加的城乡贫困老人。

马来西亚的学者也感叹，当地政府对老年人的需求所给予的支援不足，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市范围。尽管近来有较多供老年人退休的村落已经设立，但是这些退休村多数与国际企业合资，主要锁定中高端与来自海外老年移民的市场。

泰国是继新加坡之后，经历社会快速老龄化的亚细安国家。泰国在2009年才开始对“长期看护”定下明确定义，它所开展的社区型长期看护的模式包括“居家护理探访”和“鼓励社交活动”，这些计划在村民凝聚力强的乡镇地区，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果，但是要在人口稠密、人际关系疏离的城市推广，却困难重重。泰国学者语重心长地说，泰国将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，加上政局动荡，老龄化社会对国家、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，都将是一个艰

巨的挑战。

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，到底会如何改变人们对奉养父母的观念，是许多研究亚洲社会老龄化的学者所关注的课题。研讨会上国大学者发表了他们在新加坡、首尔和上海、针对50岁至69岁人士对“成功老龄化”定义的调查发现，在包括“拥有快乐”、“可以自由行动”、“没有疾病”、“经济稳定”，“继续工作”等12选项中，“能够有子女照顾我”和“与子女同住”这两个选项，在这三个城市中的排名较后，尽管这两个选项的支持度都超过半数。中高年者对老年奉养的观念有所改变，或许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时代不同了，做父母的已不能再期待现代的孩子愿意与父母同住，孝敬并奉养他们。然而，想起最近友人发来的一段感言说道：“我们这一代，是最后一代奉养父母的孩子，也是第一代不用子女奉养的父母。我们是最棒的一代！”这个说法意味着，未来的年老一代，纵然珍惜与儿孙的交流，但更期望他们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，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。

其实，本地青年一般都希望，他们有能力奉养父母。最近一项关于日本和新加坡女大学生对奉养父母的意愿的调查发现，与日本相比，更多新加坡女大学生希望将来能和父母同住或住得更靠近；她们更愿意尽其所能，为父母提供经济的助力，以及看护上的需要。她们也表示，将来需要聘请外籍女佣，帮忙提供居家看护服务。年轻人有孝心固然可喜，可是现实生活的压力，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雇佣情况，加上若得同时看顾多名需要长期看护的年迈

父母，对于兄弟姐妹不多的家庭，肯定是个沉重的担子。

制定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，是帮助减轻家庭看护负担的措施之一；韩国自2008年实施了这个制度，至少半年在生活上难以自理而需要护理的韩国年长者，可申请“需要长期护理”的认定，以申请保险津贴用来支付大部分长期护理的费用。这包括居家看护、复健训练指导、聘请接受超过120个小时训练及通过考试的长期护理专业人员帮忙处理家务、洗澡服务等。但韩国学者透露，虽然长期护理专业人员的数目激增，有四成却是“受雇”于自家的老人，公私不明的界线令政府为难，因此从今年开始，韩国政府规定，护理自家老年人的人员，一天最多仅能提供一个小时须收费的护理。

近年来不少国家的老龄化政策，也开始更注重预防，以缓解护理需求和财政压力。日本在10年前已通过改革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制定了护理与预防并重的体系。在研讨会上，香港学者介绍了一项即将在4月推出的新防范计划，培训社区里的年轻乐龄当特定的运动教练，教导其他年长者，以期通过正确的运动，有效推迟老年衰退。

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际趋势下，出现更多这类沟通平台以交流经验是可贵的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财力、人力，以及时间的限制下，要圆满实现老有所养及所依的理想诚然不易，但是若能配合具前瞻性、符合民情的政策措施的实施，“人瑞社会”也同样可以是安居乐业的乐园。

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副教授）